

# 榜首人物

Prakash Loungani对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Robert Barro的采访



大多数的学术文章都没能在学术界激起太大的反响，Robert Barro 笔下的大作却绝非如此。一份最新的榜单列举了自1970年以来在经济学领域最富影响力的146篇文章，Robert Barro以6篇文章入选而高居榜首——和他共享这个荣誉的只有两位学者（Eugene Fama和Joseph Stiglitz）。但是，我们很难根据Barro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含有氟桥的聚钴化合物的水晶结构》——预言出他会在经济学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Barro身上发生了什么？他本来打算呆在加州理工大学找一份与物理学相关的差事，是什么使他改变了初衷？“这得怪Richard Feynman（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Barro说，“Feynman是一个充满伟大灵感的人，但他所教的东西常常让我无法理解，这使我认识到自己将来无法在物理学领域成为顶尖人物。”于是，Barro转而研究经济学。之所以转投经济学阵营，一方面，利用他的技术和数学背景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激励了他，另一方面，Barro主修经济学的哥哥也给他树立了榜样。

Barro的宏观经济学家生涯有两个值得铭记的转折点。第一个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他背弃了在哈佛读

本科时所学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并成为了芝加哥学派所领导的反凯恩斯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凯恩斯主张，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政策来消除国民收入的起伏波动，同时，凯恩斯也因其经济周期理论闻名于世。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学者和决策者们都在重新思考政府是否有能力修匀经济起伏。Barro六篇上榜论文中的四篇外加他所著述的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都有力地支持了“政府应该扮演更加低调的角色”这样一种学术观点。

Barro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转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在那个时候，宏观经济学界自己作出了一次路线修正。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宏观经济学界都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探讨是什么引发了与经济周期相关联的国民收入短暂波动。在这几十年里，诸如“虽然在不同的年代里增长速度不同，但到底是什么在驱使国民收入增长？”、“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之间会存在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这样的问题都不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但是，再次受到芝加哥大学学者们作出的理论创新的驱策，宏观经济学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转而研究上述那几个早先被人们忽视的问题。而Barro走在了潮流的前头，他所著的两篇

论文“开创了对这几个问题答案进行经验主义探索的先河”。IMF 首席经济学家，也对经济增长理论作出了杰出贡献的 Simon Johnson 如此高度评价 Barro 的开创性成果。

## 一花引来万花开

Barro 所著的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一篇上榜论文所包含的思想其实十分的简单——这篇文章于 1991 年发表在经济学家季刊上。在论文中，他集合了 1960 年以来近一百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数据，并使用了許多理论家们认为会对国民收入增长产生影响的变量来对这些数据进行比较。这些变量包括，学校新生入学率（经济学家口中所说的“人力资源”的标志性指标）、私人投资、政府行为的种类及规模，以及适当的经济测算体系、政府行为引致的市场扭曲、政治动荡等等。

Barro 考察了这些变量与国民收入增长之间的统计学联系。他发现，“只要拥有了大量优质的人力资本，穷国就更能容易地赶上富国的发展脚步，否则不能。”他同时发现，政府投资对刺激经济增长收效甚微，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甚至会减缓经济增长。

此外，政治动荡和市场扭曲同样会导致低增长。

关于数据集与学者，存在着这样一个简单事实：你只要构建好一个数据集，其他学者们就会凑过来进行相关研究。这一点在 Barro 所建立的数据集身上同样应验了：它吸引了许多宏观经济学家投身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在一本由 Barro 于 1991 年所发表的论文衍生而来的著作中，他所归纳的那一长串对经济发展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冠以“Barro 变量”的名号而变得十分知名。Barro 论文中的一些结论也比别人的有关理论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Johnson 认为，Barro 所做的这些在给相关著作提供经验主义基础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却不能把它们推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去。

Barro 关于经济增长的著述如此具有影响力，以至于那些现在 30 多岁的年轻宏观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认同他 90 年代的作品，而不是早期那些关于经济周期理论的作品。

## 如果你行，请赶上我

Barro 的另一篇有关经济增长理论的上榜论文——这篇文章于 1992 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季刊》上，是

与 Xavier Sala-i-Martin 合著的——中所阐述的主要结论如此成功地接受了时间的考验，以至于 Barro 在哈佛的同事 Larry Summer 赞誉它为“趋同理论中的铁律。”与 Barro 1991 年那篇文章一样，这篇论文思想简朴，并引入了许多新的数据。这篇论文成功的诀窍是使用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数据，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把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Barro 变量”近似地假定为是完全相同的。比如经济制度和政治动荡的程度等等。

不必操心的是，这些变量的测量尺度为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定的问题上提供了一个明晰的路径：最初比较贫穷的地区能够追赶上富裕地区吗？就美国各州而言，答案是肯定的。美国内战导致了南方各州普遍比其他各州更加贫穷。但是 Barro 和 Sala 指出，在 1880 年以后的差不多 100 年时间里，那些起初比较贫穷的州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这就是追赶，或者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这就是“趋同”。当然，穷州追赶富州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仅仅为每年 2% 到 3%。

这种推测致使 Barro 于 1991 年在《华尔街日报》上提出警告：两德统一以后，东德的国民收入水平会迅速赶上西德这样一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趋同的力量最终会很强大”，他写到，“但是东西德之间任何一个方面要想在短期内趋同是不可想象的。”结果表明，在一阵短暂的冲刺之后，东德的生产力水平停滞在了相当于西德 75% 的水平，尽管政府为了加速这一进程而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 更富有，或更贫穷

在一些学术性文章以及《华尔街日报》和《商业周刊》上的专栏中，Barro 继续探究着一些国家富有而另一些国家贫穷的原因。Barro 认为，事实表明，穷国可以通过保护产权，促进法制建设，培育自由的国内市场以及开放国际贸易等方式来增加收入。此外，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加大对教育、医疗以及某些类型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Barro 认为“软政策”则对经济增长起不到多少作用——如推进民主，制定专门针对妇女的教育计划，保护环境，消除收入上的不平等，创建市民组织及提升社会资本等等。但是，正如 Barro 在他 2002 年的论文集《没有什么神圣的》中所写的那样，他的这些观点并不为所有人接受。他写道：“1998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我的同事阿玛蒂亚·森，一些评论员们认为这是对‘软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观点的一种认可。”

然而，尽管承认“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些软性措施体现了他们内心的需要，”Barro 仍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并指出，他的观点根植于探究这些软性因素是否确实

能够增加收入的细致研究。事实上，近年来，Barro 和他的妻子兼同事哈佛教授 Rachel McCleary 已经完成了到目前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以确定宗教（或许这才是终极软性因素）是怎样影响收入增长的（见专栏）。

## 顺其自然

从 Barro 的有关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中不难看出，他相信，正如他在 1996 年的论文集 *Getting It Right* 中所阐述的那样：为加速经济增长，政府应该只去执行“有限范围内的职能”。他写道，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念书时曾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于出现的任何社会问题，我都毫不迟疑地认为解决方案中应包括政府的干预。”但是如今他却持有截然相反的见解；他将自己现在的哲学形容为“自由意志主义（或古典自由派）”，而不是保守派或共和主义。

从自由意志主义观点出发，Barro 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能在于“定义并保护产权”，政府的其他行为还可以包括“保证（而不是直接提供）教育的基础水平，提供最低福利保障，以及参与小范围基础设施的投资（如高速公路和机场）。”他认为，盲目扩张政府职能使之超出上述范围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害的。

“从自由意志主义观点出发，Barro 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能在于‘定义并保护产权’。”

Barro 认为中国的经验证实了他的上述观点——他与一所中国高校的合作使他如今能频繁地出入中国。

### 宗教能促进经济增长吗？

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与职业道德类似，宗教可以通过对性格的塑造来影响经济表现。Barro 和 McCleary 针对这一观点设计了一个严格的测试。和 Barro 早期的工作一样，此次研究最独特的方面在于对大量新近数据的精心汇编。这些来源于六项世界性调查的，有关正规宗教服务机构中的宗教信仰和参与人数的数据，就覆盖了大约 50 个国家。

Barro 和 McCleary 发现，那些国民拥有更为强烈的宗教信仰（表现为确实相信天堂和地狱的存在）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会更快——这一发现与韦伯的理论是一致的。然而，一旦宗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被证明，更多的正规宗教服务机构的出现将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所以宗教服务机构的设置得有一个限度，它可以影响信仰，但不能以耗费时间和资源为代价，否则就会抑制经济增长。

他说，这个国家在共产主义道路上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当政府想要努力干预经济生活中的所有方面时，就会把事情搅得一团糟。不过现在，他补充道，他在中国所遇到的许多政府官员和平民的那种“非常资本主义和商业化”的态度所震撼。“那里有所大学的校园里甚至树立着亚当·斯密的雕像，而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哈佛，一定会有许多人提出抗议的。”他开玩笑道。

Barro 的自由意志主义信仰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和其他许多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不同，他并没有成为美国或其他国家政府的出色的政治顾问。他说，一个认为政府的很多职能应当取消的人是难以受到政府欢迎的。在论文集《没有什么神圣的》中，他坦率地承认，他向政府提出的那些进行冒险式开创式尝试的建议很少能被采纳。在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里，他描述了自己 1998 年夏天正在科德角度假时，被匆匆派往莫斯科的经历；俄罗斯政府没有采纳他关于建立货币局的建议。韩国政府同样也拒绝了他关于采用美元作为其流通货币以及改变对外资并购韩国国家银行事件采取抵制态度的建议。

## 并非“视金如粪”

即便没有 20 世纪 90 年代那些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论文，Barro 作为一名卓越的宏观经济学家的地位依然牢固。早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他的那些宣扬政府应当采取自由放任的手段来修匀国民收入波动的论文就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Barro 的著作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的一部分，这一革命取代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当积极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来控制来修匀经济周期）。由于得到了在统计学关系上表现得十分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支持，在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大众对政府控制经济周期的能力空前信任。60 年代的经验表明，政府可以简单地通过多印些钞票（提高通货膨胀率）来给人们提供工作机会（减少失业率）。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菲利普斯曲线似乎意味着货币政策确实卓有成效。

在保守派经济学者如 Milton Friedman 眼中，菲利普斯曲线毫无意义：它似乎在暗示，政府可以通过印刷钞票这样一种成本相当低廉的方法来达到诸如增加就业之类的实际目标。这就好比用一把厘米尺代替英寸尺来丈量以使人变得更高一样荒谬。Friedman 在当时因为持有这种观点而受到奚落，但是 Barro 说，“甚至在我 1968 年夏天离开哈佛之前，就意识到那些针对 Milton 的攻击是无意义的，不过是一种嫉妒的表现罢了。”

由于受到 Friedman 以及同样来自芝加哥大学的

Robert Lucas 等人著作的激励, Barro 于 1977 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所提供的证据表明, 激进的货币政策只有在中央银行所制造的通货膨胀大到让人吃惊的程度时才可能降低美国的失业率。紧接着, 他又与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现在克莱姆森大学执教的 David Gordon 合作撰写了另外两篇这方面的论文。其中的第一篇论文指出, 当人们意识到中央银行即将制造惊人的通货膨胀时, 整个社会会在一种糟糕的平衡之下停滞不前: 通货膨胀过度, 而失业率却不会比以前下降多少。第二篇文章介绍了一条摆脱这种糟糕平衡的出路。如果中央银行能够致力于遵守规范其行为的规则, 通货膨胀率将会低于其未能遵守规则的情况。即使遵守了行为规范, 中央银行仍会有制造程度惊人的通货膨胀的冲动, 只是这种冲动会被随后发生的信用危机所缓和。

Barro 和 Gordon 的论文成为“改变中央银行行为方式运动”的一部分。现代中央银行更趋向于遵循那些能使其不制造过度通货膨胀的规则, 以捍卫它们作为反通货膨胀的斗士的信用。现在很多中央银行针对通货膨胀水平同时设置了一个公开的控制目标和一个内部控制目标, 它们根本不会允许恶性通货膨胀发生。

**您肯定是在开玩笑, Barro 先生!**

Barro 对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的攻击, 得到一大批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们的支持。而在此之前, Barro 对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攻击则是单枪匹马进行的。凯恩斯对于财政政策的观点也是十分激进的: 政府应当利用财政预算赤字来修匀私人收入的波动。当私有经济的发展停滞时, 政府应当通过运行更大规模的预算赤字来刺激私人消费, 并且应当用举债而不是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填补赤字。

在 1974 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 Barro 指出, 是选择用借债还是增加税收的方式来筹措资金都是无关紧要、没有区别的。如果政府用借债的方式来维持财政赤字, 人们也许会意识到, 政府终究有一天会通过增加赋税来偿还这些负债。于是, 他们会减少消费、增加存款以备支付将来的税收。因此, 政府试图通过借债来刺激私人消费的努力是不会有好成效的。如果把这些未来的税务负担都遗留给下一代, 情况又会如何呢? 今天的人们会不会因为政府的举债而并不会感到自己变得更加富有了呢? Barro 在论文中说, 如果这一代人关心的并不只是他们自己的支出, 而是包括他们的下一代的支出的话, 情况就并非如此。如果他们关心自己的孩子, 他们就会攒下更多的钱留给孩子, 以供孩子们支付未来的税收负担。于是, 政府

试图利用预算赤字来刺激当代人消费的努力再一次失败了。

Barro 的观点引起了一片怀疑。1990 年刊发于《经济人》上的“学派简介”指出: Barro 提出的诸如“要无穷无尽地向前看”、“父母都是没有私心的”之类的看法都是疯狂的、不理性的。在一开始, 就算是经济学家也不免会对这些看法抱以嘲笑。然而随着时间流逝, Barro 的模型慢慢变得权威起来, 故而, 即便是当初批评他的那些人也不得不利用他的模型来作为自己的模型的基点。《经济人》总结到, 受到 Barro 理论的影响, “很少有人还像以前那样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抱以很高的期望了。”

**会有更多的上榜论文?**

曾与 Barro 共事的波士顿大学教授 Robert King 称 Barro 为“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影响力的应用宏观经济学家”。King 同时还告诉《金融与发展》, 这种影响力并非源自某一项单独的贡献, 而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在宏观经济学的每一个主干领域里, 你都不得不与 Barro 所写的论文相竞争。”

近年来, Barro 一直致力于解决一个长期困扰宏观经济学界和金融界的难题, 即所谓的“股权溢价之谜”。这个难题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历史上, 股票的收益率远远超过了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当然, 股票所具有的更高的风险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会有更高的收益率。但是, 这种收益的差别如此之大, 以至于经济学家们认为, 那些放弃股票高收益率而购买政府债券的投资者对于风险的厌恶程度大得不合情理。Barro 认为, 像经济大萧条和 9·11 事件这样罕见的大灾难, 尽管发生的几率极低, 却会使投资者们保持对政府债券这类可靠资产的需求。

且不管这项研究是否会像他的其他论文一样进入最有影响力论文行列, 毋庸置疑的是, Barro 一直在努力。在 1999 年出版的论文集《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中的一篇短文里, 他写道: “当处于巅峰时, 我从来不曾真正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能吸引我离开这个顶峰。”他不理解为何纽约扬基队的击球手 Joe DiMaggio 会在 1951 年尚处事业巅峰之时退役; 为什么披头士乐队、Simon 和 Garfunkel 组合会在他们最辉煌的时候解散。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 公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错过了许多即使算不上最伟大也必定十分优秀的演出。值得 Barro 崇拜者高兴的是, Barro 曾经含蓄地做出承诺, 他不会提早退休, 他会在这个领域里继续努力, 继续前进!

Prakash Loungani, IMF 对外关系部副处长。